

我的心与他同在

—— 温妮·曼德拉自述



WINNIE MANDELA

Part of My Soul

Penguin Books 1985

根据企鹅出版公司1985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米小平

封面设计：丁 方

我的心与他同在——温妮·曼德拉自述

安妮·本杰明 编写 玛丽·本森 修订

秦小梅 译 星 禾 校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5.75 字数：130,000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7-5012-0125-0/K·19 定价：1.4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温妮·曼德拉的自传。温妮是南非民权运动的著名领导人，被黑人群众称为“黑人之母”和“黑人精神的化身”。她在1958年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结婚后，便以整个身心投入黑人解放运动。长期以来，她受尽南非当局的残酷迫害：逮捕、监禁、流放、与丈夫的长期分离、各种禁令的限制、歹徒的袭击、警察无休止的蛮横虐待乃至人身污辱、流言蜚语的中伤，等等。然而，她深知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斗争，决心改造病态的南非。她自述的亲身经历，既是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血泪控诉书，又是为黑人解放事业忠诚献身的英勇斗争史。

温妮·曼德拉为南非黑人争自由、求解放所进行的卓越活动，受到举世有识之士和舆论界的同情和支持。1987年，世界250家报纸评选她为世界十大女杰之一，温妮膺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英文版关于本书的出版说明

温妮·曼德拉1934年9月出生于南非特兰斯凯一个小村庄里，原名诺姆扎莫·温妮弗莱·玛迪基泽拉。在约翰内斯堡学习之后，她成为南非第一个黑人妇女社会工作者。1958年，她同黑人解放运动的伟大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结婚，成为曼德拉政治上的同事，多年来和他一起从事危险的地下政治工作。曼德拉1962年被捕，1964年在里沃尼亚审判后被判处无期徒刑。此后，温妮经历了和他长期分离的痛苦。曼德拉夫人不断遭到拘留、软禁、管制和关押。最后，她被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的布兰福特黑人区。她惨遭迫害的惊人故事是用简单明了的事实表述出来的。面对迫害，她进行了寸步不让的斗争；用她的话来说，到狱中对丈夫的探望每每使她的电池重新“充了电”。

这些年来，曼德拉夫妇已成为南非解放斗争的象征。正如曼德拉夫人所说的：“长期以来，我已经不再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我为之奋斗的理想和政治目标正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他们对我的所作所为，也正是他们对这个国家人民的所作所为……他们流放我，并不仅仅是要禁锢我个人的人身自由。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把我连同那些政治信念一起禁锢起来。然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

编写者的话

这不是一本通常意义上的自传。政府对温妮·曼德拉行动的重重限制和她每天专心致力于解放运动，使她不可能坐下来写书。更何况她很不喜欢谈论自己。她会说：她个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斗争。

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温妮·曼德拉特别允许我对她进行长时间的录音、采访。她还委托我把她丈夫在狱中写的信和其他文件加以选编发表。这本书是在南非之外编写的。虽然曼德拉夫人充分了解这一写作计划，但她未能亲自细阅付印前的手稿。本书中对其他人的访问记也同样如此。因此，书中采访内容的编写、有关文件的选编以及任何错误疏漏之处均由我本人负责。

曼德拉一家的多年好友、纳尔逊·曼德拉传的作者玛丽·本森为这部书稿、特别是有关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历史和纳尔逊·曼德拉的生平等部分的编写修改作出了非常宝贵的贡献。我谨向她深表感谢。

安妮·本杰明

1985年9月

目 录

引言.....	(1)
献给温妮·曼德拉的颂词.....	(12)
我的小西伯利亚——被流放到布兰福特.....	(16)
当父亲教我历史时, 我开始懂事了	
——在农村长大.....	(45)
和他结合后的生活里总是没有他——结识曼德拉...	(59)
我总是等待着那神圣的敲窗声——地下斗争.....	(75)
他是我力量的支柱——孤独一人.....	(87)
没有人能忍受这种侮辱而不反抗——在狱中.....	(107)
我们不能阻止我们的孩子们	
——1976年, 索韦托暴动.....	(124)
对话的篇章最后结束了——政治形势.....	(132)
我的心与他同在——访问罗本岛和普尔斯莫尔.....	(144)
附件一: 对温妮·曼德拉的禁令	
附件二: 赴罗本岛探望纳尔逊·曼德拉的条件	
附件三: 温妮·曼德拉往来于布兰福特和罗本岛之间必须遵守的 条件	

引 言

如果想访问温妮·曼德拉，你需要从约翰内斯堡乘飞机到布隆方丹——奥兰治自由邦的首府。从机场到布兰福特的最后40英里，你需要租一辆汽车。我几乎总是乘飞机去。如果想当天返回约翰内斯堡，自己开车去是太远了。布兰福特距约翰内斯堡大约300英里，路也不太好走。

从布隆方丹到布兰福特要穿过一片有着独特魅力的广阔的农村地区；开阔的平原一望无际，间而有几座平顶的山点缀其间。奥兰治自由邦草原上这些星罗棋布的奇妙的高地是地球上的地理奇观之一。你常常看到一簇簇高大的树丛，它们使农田免受太阳的暴晒和寒冬风暴的袭击。广阔的草原上，偶尔可以见到几架孤零零的水车，它们的轮子在风中转动，给整个农村带来一种单调呆板的节奏。到了黄昏，水车映照在火红的落日余辉中，给这幅空旷的风景画面焕然一新地增添了几分独特的诗意。这便是典型的高原，阿菲里卡人^①国土的中心，奥兰治自由邦。

我多次沿着这条路到布兰福特。不管什么季节，什么时辰，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总是一个模样，有点过于平淡，轮廓呆板、连阴影也见不到，好象没有生命，没有变化，没有时间。也许，我的一位朋友所指的正是这一点——他曾把这

^① 即南非荷兰人，又称布尔人。——译者

里的农村叫作古董，又说“这和那里的人倒很相称。”

事实上，当奥兰治自由邦在1854年作为一个独立的布尔人共和国建立起来的时候，有一股移民确实想把摩西人原来的法律当作新宪法的一部分。

在通往布兰福特的道路两旁，稀稀拉拉分散地居住着一些农场主。和他们的先辈一样，他们养牛、养羊。他们都姓比勒陀利厄斯、乌依尔、莱提埃夫或者鲍特吉埃特。这些人深深地相信，在他们占有非洲这块地方之前，这里是无人居住的；是“全能的上帝世代地引导着他们，奇迹般地把他们从困窘危险的境界中解救出来，从许许多多的国家把他们的祖先集合在一起，然后把这片土地赐给他们，归他们所有……”南非宪法的序言就是这么讲的，布尔人认为它句句是真理。历史学家，甚至现实本身，都不会教给他们与此不同的东西。

他们本来应该知道，早在1836年，这块土地就不是“无人居住的”。开普殖民地的英国当局曾经派出一个远征队，队长安德鲁·史密斯博士详细地报告过现在是“自由邦”的这片高原地带的情况。他说那里有许许多多不大的人种居民群，政治局势日趋紧张；他们的统治者曼塔提西是一位声望很高的索托酋长的遗孀，“一个异常聪敏、美丽和富有政治才干的女人”。

布兰福特是一个典型的阿菲里卡人的小镇。它被看作“白人镇”，虽然白人只占镇上人口的1/4。全镇有3000白人，9000黑人。然而土生土长的黑人——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却无足轻重；他们的居住区没有名字，鲜为人知。这正象在

1836年，在筹划布尔人远征^①的过程中，玛·恩塔提西和她的臣民没有发挥任何影响一样。

阿菲里卡人顽固地抱住南非是个“白人国家”这一虚假概念。如果你试图寻找其中的奥妙，有几条原因会反反复复地显现到你的面前。首先是宗教方面的动机，但与此紧密相联的却是对宗教信仰的极大亵渎：贪婪、胆怯和权欲。

在英国人禁止保留奴隶，甚至开始考虑拟订一个赋予各种族以平等权利的宪法时，布尔人离开了开普地区。远征队队长的侄女皮埃特·莱提埃夫阐述了白人的观点：“迫使我们走到这种地步的，与其说是奴隶们的自由，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被放到了和基督徒平等的地位上——这违背了上帝的法规、违背了大自然区分人种和肤色的本意。向这样一种屈辱低头，是任何一个有身份的基督徒都无法忍受的；为了维护教旨的纯洁，我们宁愿撤离。”今天的形势正反映了这种情绪：布兰福特地区共有10座教堂，其中9座只供白人使用。

1977年，我第一次来到布兰福特。我想看看监禁温妮·曼德拉的地方。在那一年5月早些时候的一天，她被送到这里。从比喻的意义上讲，她的到来是不是可以被视为皮埃特·莱提埃夫和黑人女英雄玛·恩塔提西之间的一场被延误了很久的遭遇战呢？

我开车过了镇上的标记牌，过了沃尔克斯堡尔和安德利斯·比勒陀利斯公园。我不愿意引起人们的注意，便停下车，准备步行去镇子的中心。然而，我发现我已经在镇中心

^① 约一万多布尔人先后成群结队地进行了南非历史上有名的大迁徙。他们越过平原，向奥兰治河流域和纳塔尔进发，用武力撵走当地的班图人，占领新土地。——译者

了。原来，我碰巧闯进去的那条街就是布兰福特的主要街道，或者说唯一的街道——“布尔人远征路”。

每次去布兰福特，我都要竭力摆脱我一走过这条路上头几所房子就会出现焦躁心情。我设法使自己相信，在“布尔人远征路”上连续不断驶来驶去的警车只不过是生活的一个方面，就象任何其他南非城镇一样。如果我这个只逗留几小时的来访者会觉得自己仿佛赤裸裸地暴露在这个偏僻地方而毫无安全感，那么，一个在这里度过了七个春秋，而且昼夜24小时都受到警察监视的妇女又会有什么感受呢？

城镇本身并没多少值得一看的东西：路的两旁有几个商店、标准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一个警察站、两个小旅馆、一个邮局、一个加油站、两个教堂、一个为黑人开设的啤酒馆，在这些地方不会迷路。人行道上搭着殖民地时期那种样式简单的顶棚，几条小路旁坐落着白人居住的有凉台的房屋。一个超级市场、一个报纸经销处、再往前一点是火车站、小镇的尽头有两座大粮仓——这就是镇上的全部设施。

布兰福特的社会生活也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人们每个星期天在教堂里相会，安排高尔夫球比赛或在公园里野餐。在这类传统活动中，牛排总是不会少的。一年一度每个人都必须参加的唯一重要社交活动就是学校大厅里的游艺节目。

在这种气氛下，完全不必担心新思想的威胁，更不用说自由思想了。在整个布兰福特，每天只能售出三份自由党的英文报《兰德每日邮报》，现在该报已停刊。几年前开张的超级市场在挣扎着维持局面。曾想在此地碰碰运气的乘车观看的电影院也因为没有观众而不得不关门大吉。

如果说有什么浑浑噩噩的穷乡僻壤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直到1977年温妮·曼德拉到来的时候，情况才有所变

化。

邮局为黑人和白人分别设立入口处；人行道上一有白人出现，黑人便立即躲开——这里的阿菲里卡人脑袋中充满了对黄金般往昔的回忆。政府把象征着黑人解放斗争的一位妇女流放到他们中间，毫无疑问是想摧毁她的反抗精神——在这远离南非政治斗争中心的地方，她将被慢慢遗忘。

然而，事情会不会与人们的预料恰恰相反呢？会不会因为这位不寻常的女人的出现而把这个坐落在通向奥兰治自由邦路上的边远小镇从田园诗般的和平与宁静中唤醒呢？布兰福特的人在谈论温妮·曼德拉时，总是说“那个女人”，听上去象是一种和解的语调——好象只要他们不叫她的正式名字，这个罪恶的精灵就不会尾随他们。

“我象一阵旋风一样袭击了这个阿菲里卡人的王国，”温妮·曼德拉笑着说，“现在，他们在布兰福特生活在恐惧当中。”

她当时的律师彼德沃尔的小办公室坐落在“布尔人远征路”。在那里，我第一次遇到了温妮·曼德拉。

“去找彼德沃尔；求他给温妮·曼德拉送个信，告诉你正在布兰福特等着见她。”——朋友们建议我这样做。

白人不得到地方长官的许可，是不能到这个镇上来的。但如果提出申请的理由是访问温妮·曼德拉，回答一般是否定的。

当我意外地出现在这个律师的办公室时，我注意到一种轻微的紧张气氛和一种淡淡的尴尬状态，但我的请求立即获得了同意。

我记得清清楚楚，给温妮·曼德拉送信的人过了两小时还未返回。我在那间空荡荡的窄小房间里等待着，心里越来越

越焦躁不安。她能按时来吗？她究竟来不来呢？在这种乱哄哄的办公室气氛中，我们能够平静地谈论问题吗？

归根结底，我来这里并不是为了简单的采访，我不是来寻找几个基本事实和数字的。我想向温妮·曼德拉——一个妇女、母亲、政治战士——询问，是什么给了她力量去忍受她现在所忍受的一切：成年之后大部分的时光都在禁令中度过，其间还遭到了无数次逮捕；婚后很快被关押，而且身上正怀着她的第一个孩子；近20年，不断地受到监视；经受审讯和严刑拷打；20年的夫妻生活只意味着被检查过的信件，偶尔对望几眼，以及在狱警的监视之下、在探视的房间里隔着玻璃的简短交谈。除此而外，什么都没有，只有和丈夫的分离，和孩子、家庭、朋友的经常分离。

她终于到了，站在门口，身板笔直，精神饱满，洋溢着感人的活力。她的外表并不威严，但我却感觉到一种动人的个性。她身穿黑绿相间的非洲长连衣裙，头巾按照科萨族传统式样从头上垂下来。她那线条分明、表情极为丰富的面孔是一面绝妙的镜子，映照出她迅速变换的内心情感。她的容貌雍容华贵：高高的颧骨，大大的眼睛深沉而好奇。它们似乎在显示，相互矛盾着的感情在这里得到了最美妙的融合：有安详的哀怨和痛苦，同时也有无拘无束的欢畅，有带着讽刺意味的清高，也有顽皮的幽默。旋即间强烈地吸引我的正是她自身内在的这种激烈冲突：欢笑和哀愁是这样接近，对美的酷爱是这样明显，尽管她已经历尽了监牢中惯常的审讯、拷打，而且早已放弃了对个人生活幸福的所有要求。

她那开朗的欢迎的微笑一瞬间把我们之间的陌生感和尴尬清除得干干净净。她怀着真挚的喜悦接受了她的朋友们托我带来的问候和小礼品。她热情地打听一些朋友和熟人的情

况，坚持让我详细地回答——这是她同他们保持联系的不多的几个途径之一。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次谈话。一种奇妙的热诚使我们越过了相互结识过程中的所有中间阶段，我们涉及到了她生活和经历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她难道不曾有过全然丧失希望和勇气的时刻吗？她曾有过完全失意和绝望的时刻吗？她生气地瞥了我一眼，很快地回答说：“当然没有。我知道，事实上这个国家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将重新得到它！我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必须忍受这一切，我怎么会失去希望呢？”

然而，她在这之后却陷入了沉默。她的沉默告诉人们，她不得不无休止地同某些势力进行斗争。通常，她的声音清亮而富有音乐感；这时，她却用沙哑的声音补充道：“在解放运动这部巨大的机器中，我太渺小了。每日每夜，都有黑人在这一事业中死去。我献上自己微小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我们的事业太伟大了，我甚至无法去想我个人的事儿。”在这些沉默的时刻，我了解到的情况也许比从她实际上说的还要多些。我透视到隐藏在她爽快的笑声和热情而坦率的仪态后面的东西。我觉得离她很近很近，我决定再次拜访她，以便更好地了解她。

在归途中，她的话语萦绕在我的脑际，我试着想象她的生活。一种时时被司法部的判决书所约束的生活。判决书开头的几句话是：“我，司法部部长吉姆·托马斯·克鲁格，已查明你从事危及或旨在危及公共秩序的活动。有鉴于此，我依据1950年安全法第九条的规定，在此宣布禁止你……”后面便是构成她生活内容的一长串规定和限制：不许进学校或大学，不许访问工厂，甚至不许访问幼儿园，不许进入准备

印刷或正在印刷任何出版物或者正在举行集会的建筑物，不许在公众集会上发表谈话，不得与两人以上的人同时相聚。在南非，任何人引用她讲的任何话都是非法的。她笑着告诉我，被送到布兰福特的时候，她把那些文件留在了警官的办公桌上。但是，即使她试图不理睬那些限制，布兰福特的安全警察也会盯住她，保证不折不扣地执行那些限制和规定。

自第一次见面之后，我多次去看望温妮·曼德拉。我总是毫不停留地驱车穿过布兰福特的“白人区”。在“白人区”几百码以外，柏油路便到了尽头，下面的路尘土飞扬，崎岖不平，蜿蜒地向上伸展到“白人区”和没有正式名称的黑人聚居地之间的“分界”线。“要千万当心的地方”，当地居民这样称呼黑人聚居区。我同温妮·曼德拉好几次都是在分界线上会面的。分界线并没有筑上栅栏，只是通向镇子的公路上的一条想象中的线，但白人不经允许是不能越过这条线的。从那里，你可以看到整个黑人聚居区：近1000所房子，象小小的灰黄色的盒子，座座都是一模一样，死板板地排列在那里；尘土飞扬的土路，没有电灯，没有柏油路面，没有路名。整个聚居区只有一个商店，一所学校和一家啤酒店。

一场倾盆大雨过后，路几乎无法通过。入夜，整个居住区被淹没在由于露天生火和点煤油灯而放出的烟雾中。这是一个典型的黑人工人居住区，单调乏味、默默无闻，就象白人的布兰福特镇本身一样。班图人管理局的房子靠近镇子入口处那条想象中的边界，它支配着周围的一切，控制着黑人区的生活。没有一个人，不管是临时的来客，还是长期的居民，能逃脱这座建筑物的眼睛。

我经常在这里等候温妮·曼德拉。她常常迟到。她有时

乘坐一辆很旧的大众牌小汽车，有时步行；有时独自一人来，但多半由两个年轻人陪同，他们是从索韦托来的曼德拉家的朋友，另外还有几个本镇的年轻人为了表示恭敬离得稍远一点。她会介绍说：“都是我的警卫。”话里颇有些讽刺意味。它暗示着，在一个“正常的”、没有种族隔离的南非，当纳尔逊·曼德拉作为黑人选出的领袖而站到他合法的位置上时，她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子。她站在小镇那布满尘埃的路上，身体笔直，显得很美丽；不论是披着科萨族的传统长袍，还是穿着欧洲式的长连衣裙，都自然而然流露着温文尔雅的风采。她不动声色，对班图人管理局的官员们不屑一顾。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她径直和三个同伴一起坐进我的车子，尽管禁令上明文规定不允许她这样作。事实上，在这种时刻，她更象一位才华横溢、风度潇洒、代表着自己祖国的女大使，而不象一个流亡在边远的黑人居民区、失去了活动自由的人。

她的仪表使我想起她的一位白人朋友的话：“温妮是象一位非洲女王那样走向监牢的。”有一次，在去监狱的路上，这位朋友曾陪伴过她。

看上去，她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她的外表和周围环境所形成的简直是荒诞可笑的对比。她仿佛同在家里一样，这个布兰福特镇仿佛就是为她准备的；而她的住宅，802号，仿佛是她接待世界各地贵宾的一个很适宜的地方。

每次见到她，我总是寻找绝望和听天由命的迹象，但每次都找不到。她具有政治战士不屈不挠的品格，能够对付哪怕是最危急的环境而不迷失自己的目标，不仅不畏惧失败和挫折，而且能从中汲取新的力量。

温妮·曼德拉以坚定不移的韧性在布兰福特生活着。连

她的丈夫也对此惊讶不已。

她已经深深地陶醉在她在那里开始的各项计划之中。在给纳尔逊·曼德拉的信中，她以安详而讥讽的笔触把这块流放地描写为一个“确实相当不错”的地方。似乎已经不存在那些她不得不承受的艰辛和困苦：每天打扫简陋的房间数小时，因为尘土会从墙壁小小的裂缝中钻进来；与朋友们的通信联系被切断；每天在布兰福特邮局呆三个小时，以便让人们能通过电话同她保持接触。有时候，她那总是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会变得凄惨不堪，甚至连续好几天连煤油也买不起。而比这一切更为严重的是，她一直生活在威胁之下，没完没了地受安全警察的迫害。最后，还有那些悲痛、困苦、孤独的时刻，这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我同她第一次见面时，从她眼神中看到的悲哀始终伴随着她。她并不是一位英雄式的女性——我为这点而喜爱她。她并没有变成一位只有一个念头、强硬得刀枪不入的政治战士，她身上仍然存留着容易受到伤害的弱点。

1983年，我第一次获得允许到温妮·曼德拉那所小房子里去见她。我被当局告知，有关规定完全是为了我的安全，如果我出了什么差错，他们概不负责。就这样，我终于到了她的“家”。如果我不把“家”这个字用引号括起来，她不会原谅我。她把这三间总共30平方米的小屋子——卧室、厨房、起居室——称为她的“牢房”。但她想尽办法把三间“牢房”变成可以居住的地方。狭窄的起居室里黑洞洞的，虽然只是随意地摆放着家具，但也不能算不舒适。她的大多数家具在她到达此地后立即被运回了索韦托。沙发的扶手上铺着很动人的小块的刺绣品，上面绣着乡村景色，有母鸡和孩子的图案。这是邻居妇女送给她的。

架子上有一台小型的用电池供电的电视机；屋里还有别人送的各种图书，在一些硬纸片上编出了粗略的目录。黑人居住区的人如果有兴趣阅读，可以从她那里借到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撒尔·白罗著的《雨王》，关于英国历史的书，或是基布朗写的《伊斯兰教祖》。

往日在那屋里可以见到的一排排药瓶子现在不见了。一个小小的、整洁的、用预制件建成的房子出现在她的花园里。那是由许多人捐钱建成的，用来做黑人居民的“医疗诊所”。她不必再在自己的房间或车库里给人看病了。

离开这所房子，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开满鲜花的花园中。以往的碎砖乱瓦现在都被鲜花和灌木覆盖住了。站在可以遮住太阳和隔壁警察眼睛的一棵垂柳的树荫里，我想起了塞利·莫特兰纳的话。他曾经这样描写温妮·曼德拉的力量：“他们要想建一堵墙围住她是永远不会成功的。不管把她流放到什么地方——保留地、荒漠，或者森林——都没有用处。这个女人是如此富于朝气，她走到哪儿，就会使哪儿的鸟儿娓娓歌唱，使哪儿的树木飒飒作响。这是肯定无疑的。”